

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

邵燕祥诗歌研究论集

吴思敬 李文钢 编

學苑出版社

阴郁的日子

下雪的日子

没有酒是寂寞的

没有炭是寒冷的

你从冰封的路上来

雪天的炭

而我是尘封的酒

你温我 热我 煮我

以你的火点燃我的火

我不忍见你焚烧成灰

你不忍见我横流一醉

窗上冰花如刻

斗室却如春 微醺着

感激与安慰

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

——邵燕祥诗歌研究论集

吴思敬 李文钢 编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：邵燕祥诗歌研究论集 / 吴思敬，李文钢编．
—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15.6
ISBN 978-7-5077-4782-9

I . ①苦… II . ①吴… ②李… III . ①邵燕祥—诗歌研究—文集
IV . ① I207.2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0172 号

出版人：孟 白

责任编辑：刘 丰

出版发行：学苑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79

网 址：www.book001.com

电子邮箱：xueyuanpress@163.com

销售电话：010-67601101（销售部） 67603091（总编室）

印 刷 厂：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尺寸：720×1020 1/16

印 张：46.5 印张

字 数：730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168.00 元

序 言

吴思敬

邵燕祥是中国当代诗坛我最尊敬的诗人之一，他和近年仙逝的牛汉先生一样，是位硬骨头的诗人，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品与诗品完美统一的诗人。如屠岸先生所说：“他是我们时代的良心，是当代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。”^①当然，邵燕祥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达到这一高度的，而是经过时代的淬火，经过地狱的磨炼，经过他灵魂的煎熬与不断地自我解剖，才得以实现的。邵燕祥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诗歌写作，50 年代成为伴随共和国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，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，从此在诗坛沉寂 22 年。新时期后作为“归来的诗人”复现诗坛，其思想冲出了牢笼，在寻找灵魂与良知中，其诗艺也日益精纯。

一手擎着匕首，一手擎着诗

邵燕祥是一位早慧的诗人。他曾这样叙述其诗歌创作的起因：“我的童年是寂寞而压抑的。1939 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，我居住的古城北平已经成了日本

^① 屠岸：《邵燕祥：时代的良心、正直知识分子的代表、思想者》，《生正逢时——屠岸自述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，第 329 页。

人信马由缰的世界。属于我的世界只是学校的教室和自家的院落。”^①“内战。日本军国主义入侵。接着又是内战……这就是从我 1933 年出生以至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。我家虽勉可温饱，但精神的忧患压得一个孩子早熟了。这样的国土上，不应有梦。然而我偏要做梦，并学着说梦。这些诗，记下了好梦，也记下了噩梦；记下了好梦的破灭，也记下了噩梦的惊醒。”^②邵燕祥的诗歌之梦是从 1947 年开始的。此时正是国共决战的前夜。北平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，但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十分活跃。1946 年初，邵燕祥读到了一本油印的毛泽东的《论联合政府》，为书中所提的建立一个和平、统一、自由、民主、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所吸引。1947 年他参加了“五二〇”反饥饿反内战运动，并于 10 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“民主青年联盟”（民联）。他说：“我更加全心全意地跟着被反动派诬为‘匪谍’的地下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，参加读书会、壁报、话剧团，利用一切条件团结同学，宣传党的主张；还搞过团结老师的尊师募捐活动。我和同志们一样如饥似渴地找一切可能找到的革命书刊来读。”^③此时的邵燕祥，在政治上是激进的，但是在文艺观上却还没来得及统一到党的文艺路线上来。如他所言：“在 1949 年前的地下活动的日子里，我还没有读到过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没有形成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意识，那时诗里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。”^④但是由于诗人生活在方生的与濒死的两种势力决战的前夜，他已有自己对时局的看法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。当他坦诚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诗句中的时候，他的诗便自发地呈现了一种倾向性，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心声。

为了理想而献身，把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，使此阶段邵燕祥诗歌显出了英雄主义的品格。邵燕祥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“民主青年联盟”后，不止一次地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志送别，并深深地羡慕他们，但他牢牢记住了一位被他当作兄长的大同志

① 邵燕祥：《伴我少年时》，《旧时船票》，上海：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3 页。

② 邵燕祥：《邵燕祥诗选序》，《邵燕祥诗选》，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，第 1—2 页。

③ 邵燕祥：《与人民共忧乐》，《赠给 18 岁的诗人》，广州：花城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53 页。

④ 邵燕祥：《引言：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》，《找灵魂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，第 3 页。

的话：你留下，每个留下的战士都是插在敌人身上的一把匕首。于是他这样写道：

我是犀利的匕首 / 插在敌人的胸上
 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 / 除非我被拔掉
 而我是没有死亡的 / 因为匕首的身体是钢铁
 你震惊于钢铁的声音吧？ / 你目眩于钢铁的闪亮吧？
 是的，我是钢铁 / 钢铁，没有死亡！
 （《匕首》）

诗句是那么强烈，情感发展又是那么自然。读着它，我们能体味出荆轲式的冲天豪情、夏明翰式的壮怀激烈。这样的诗句是与热血和生命一起喷射出来的，体现了诗歌与生命的同一。这种匕首式的诗句在此时邵燕祥的诗歌中可多处见到。1947年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遭到破坏后，诗人写出了类似座右铭的诗句以自勉：

记住 / 鲁迅先生的话：/ “名列于 / 该杀之林 / 则可，/ 悬梁服药 / 是 / 不来的！”
 （《韧的战斗》）
 从地狱出来，/ 便不再有恐惧；/ 如摈绝了天堂，/ 也便永远不回去。
 （《长短句·倔强》）
 我要驰骋在负载我的道路上 / 把荒野的尸布撕破 / 把天空的棺盖射穿……
 （《箭楼》）

在新旧世界对决的日子里，这些抒发了少年壮志的诗句，是邵燕祥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。但是这种自然流露的倾向性与后来的“为政治服务”，则有明显的区别。如邵燕祥所言：“我与地下党没有组织上的隶属，党组织也没有干预到我的写作。而我逐渐有意地改变文风，改变题材的选择，那完全出于自愿。”^①正是由于没有受到促迫与干预，邵燕祥这类作品中还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与判断。比如写于1947年的《失去譬喻的人们》，指控权力者宰割人民、发动内战，但具体指的谁，诗中并未点明，这在政治上也许是不鲜明的，但这种不点明，恰恰也使这首诗与一般的檄文有了区别，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，在不同时代的读

① 邵燕祥：《找灵魂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，第17页。

者读来，都可以有自己的联想与体会。

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在高擎着匕首的同时，又高高地擎起了诗。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诗人，他写的不是传单，而是诗。他回顾这阶段的诗歌创作时说：“我也只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。我想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所感：‘没有病不知药的苦，没有失眠不知夜的长’……我还是没能摆脱我所读过的作品对我的影响。我提起笔来写新诗的时候，总是想起我最初所深深爱过的作品，那是《画梦录》时期的何其芳，他在30年代初，可能是我还没出生时写下的《扇》：‘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，/成天凝望着悬在壁上的宫扇，/扇上的楼阁如水中的倒影，/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……’诗人表达情思、运用文字的熨帖也许永远是我所不能企及的；而当时俘虏了我这寂寞空虚的孩子的心的，却是怀古病者的无名的忧郁。”^①尽管邵燕祥知道，何其芳后来到延安去了，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，尽管邵燕祥在40年代的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，已不可能再沿着30年代何其芳的道路走下去，但何其芳感觉世界的方式，何其芳对诗歌艺术的精细的求索，仍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邵燕祥。对何其芳阴柔与精致的欣赏，不仅直接导致他早年写出《密誓》与《寂寥》，即使到了他没入到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，他依然注意到诗歌要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，不能那么直白。比如，在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所写的《风雨鸟》，在中共中央发表“五一”口号提出“打倒蒋介石，建立新中国”后所写的预言渡江的《长江上》，全是政治内容很强烈的诗，但是诗人并没有采取标语口号式的法，而是把奋勇前进、不畏牺牲的革命战士喻为“呼唤风和雨的鸟”，把摧枯拉朽的革命队伍喻为“不尽的长江，从天边/滚滚而来”。揭露腐朽凶恶的反动势力，则将之喻为一座破旧古庙中的“金菩萨”，自身难保。那时的邵燕祥，很少直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，但是从他的创作却可以看出，他已有了对诗歌本体的自觉。率意为之，自由抒写，不受羁绊，是邵燕祥早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。他在回顾1947年的创作时说：这一年“写得更多的是诗，长的短的，民歌体的自由体的。年末写了大量我名之为‘长短句’的小诗，次春陆续发表了一部分；说是诗，其实是分行记下的情感的波动，理性的闪念，只不过

^① 邵燕祥：《与人民共忧乐》，《赠给18岁的诗人》，广州：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54页。

表明一个年轻人的思维很活跃，也很自由，没受到什么教条的羁绊”^①。邵燕祥这阶段的诗，呈现出他后来的创作中很少见的那种心灵的自由感，他想写什么，就写什么，想怎么写，就怎么写，没有矫情，没有造作。他的诗既有针对当时形势的剖析，又有个人情感的抒写；既有对现实的针砭，又有对光明的礼赞；既有直抒胸臆，又有曲笔隐喻；既有一二百行的长诗，又有两三行的超短诗……。邵燕祥这阶段的写作不过三四年的时间，但是就其涉及内容的广泛、形式的多样、写法的无拘无束而言，却是他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所不能企及的。在1985年出版的《晨昏随笔》中，邵燕祥提及：“1947—1948年顷，我读了刘吉原记录的民歌集《西南采风录》，沙鸥、薛汕编的《金沙江上情歌》，又读了李季采用陕北‘信天游’写的长诗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，以及拟歌谣体的《马凡陀的山歌》。这些一洗书卷气的诗歌，以其刚健清新吸引着我，征服着我。我当时都有一些仿作。”^②

40年代后期邵燕祥的诗歌，无论是自由地抒写心灵，还是题材的广阔、表现手法的无拘无束，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些诗歌被淹没在解放前的过期报刊之中，除在《献给历史的情歌》和《邵燕祥诗选》中曾零星地选了几首外，直到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《找灵魂——邵燕祥私人卷宗：1945—1976》，才集中地披露了一批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诗作，但也不及原作数量的十分之一。这批作品，很让人感到震惊，这是邵燕祥进入诗坛最早的亮相，却已显露出逼人的才华与厚重的内涵。仅仅因为这是邵燕祥的花季年华的写作，就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学步之作，是不妥当的。由于很少接触到邵燕祥40年代的作品，一般论者和文学史评论邵燕祥，均是从50年代的他开始谈起。现代文学史对40年代诗歌创作的叙述，邵燕祥也是缺位的。实际上，考察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，可以为邵燕祥后来诗歌创作的研究提供新的视点。邵燕祥50年代乃至新时期以后的作品，都可以在40年代后期作品中溯到某些前因，这既包括他作品的长处，也包括某些局限。早期所写的《愁结》一诗，是对陷于苦闷中的同代人的慰藉：“你的眉毛 / 只为了深锁 / 才生得美丽。 / / 成天

① 邵燕祥：《找灵魂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，第43页。

② 邵燕祥：《拟〈金沙江上情歌〉》，《晨昏随笔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，第125页。

在上面 / 打些个愁结, / 怀念着明天, / 怀念过去, / 怀念过梦境, / 怀念现实。 / 这些怀念, / 是愁结。 / 但是我祈祷 / 你打开这 / 美丽的愁结, / 让眼睛的秋水 / 汨汨地流过去, / 让我的凝睇, / 从这一条秋水中 / 摆渡给你。”这是在阴霾的时代,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,调子与 50 年代的诗全然不同,但是这种对青春的关切和对话式的表情方式,却与后者有着相通之处。邵燕祥早期写作中有时过于散漫而缺乏节制,这一毛病也沿袭到 50 年代。邵燕祥在《晨昏随笔》中说过这样一件事:他在 1952 年 11 月间写的《到远方去》初稿,有 242 行,严辰同志读后认为芜杂,放了几个月后,他重新删改与压缩,定稿时仅为 40 行。^①

关注邵燕祥 40 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,还有一层意义,那就是可以与邵燕祥 50 年代的作品做一对照,从而发现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,是如何被“规训”、被塑造成一个“政治抒情诗人”,被引导到“为政治服务”的道路上,路子越走越窄的,从而让我们牢记历史的教训。以邵燕祥自己的个性、修养和偏好,假如没有 40 年代后期的烽火连天的战争,假如没有那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,假如没有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,邵燕祥也许会沿着 30 年代何其芳或 40 年代“九叶”诗人的道路走下去。但是 40 年代后期这风云变幻的时代,已不允许邵燕祥去构建自己的象牙之塔。等到 1949 年以后,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化,邵燕祥 40 年代后期所写的大多数作品就很难发表出来了。因为这种自发的政治抒怀,其内容不一定符合宣传规范。邵燕祥曾举一例:“在 50 年代时,有一位党报的高级编辑,又是诗人,看到我 1948 年写的短诗《旗》:‘旗的手在招展,旗的心在跳……’竟问:‘什么旗?为什么不是红旗?’”^②这种政治对创作的干预、官员对诗人的“修理”,使得邵燕祥在解放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无拘无束的写法,而去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要求,从而使诗风与 40 年代后期比有了重要的转变。

① 邵燕祥:《从二百四十二行到四十行》,见《晨昏随笔》,北京:三联书店 1985 年版,第 132 页。

② 邵燕祥:《找灵魂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,第 78 页。

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 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

邵燕祥在《找灵魂》一书的〈引言〉中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，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：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 / 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。”^①在《找灵魂》的最后，邵燕祥以诗为“跋”，其中写道：“战后三十年，陈尸现场 / 只为了证明真诚之为虚妄 / 一个游荡的灵魂隐入书里 / 找来找去，找不到失踪的自己。”^②把这两段文字联系起来，可以说概括了邵燕祥那失去了自我、失去了自由、失去了独立的思想、因而迷失了灵魂的前半生。

邵燕祥说：“1949年，中国历史经历了划时代的大变动，大量1949年以前艺术上、思想上成熟的老作家，主要是从国（民党）统（治）区来的老作家，自愿地，或被动地，或‘被迫自愿’地放下了笔，或者索性是手里的笔被夺走了。然而，仅仅靠从延安和老解放区来的作家，不足以支撑局面。当时急需补充有生力量。这时急需一批党认为自己培养的、可靠的一代青年作者。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被推出来的；1956年春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作者会，就是由作协和团中央共同举办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之一度在文坛上‘放声歌唱’，是以许多老作家的沉默为代价的。其中，就包括了以在座的牛汉同志为代表的‘七月派’，后来所称的‘九叶派’，还有屠岸同志等等。”^③的确像邵燕祥说的，像他这样的年轻诗人，比起卞之琳等30年代的“汉园诗人”，以及此后的“七月派”、“九叶派”诗人，显然容易转换声部，融入“时间开始了”这样的时代强音中来。这阶段的邵燕祥，满怀欣喜地迎来了新生的共和国，以他的单纯、热烈与真诚，写出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，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《歌唱北京城》。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的发布，激发了在广播电台工业组工作的诗人的热情，他把一个时代的梦想，聚焦在一位年轻的地质勘探队员的身上，写出了《到远方去》：

收拾停当我的行装，/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。/ 心爱的同志送我 / 告别天安门

① 邵燕祥：《找灵魂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7页。

② 同上，第314页。

③ 邵燕祥：《说几句心里话——在“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”闭幕式上的发言》，《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、廊坊师范学院、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，2007年4月，第143页。

广场。//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，/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。/ 在我将去的矿井，/ 还只是一片荒凉。// 但是都没有的都将会有，/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。/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，/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。// 那声音将要传到北京，/ 跟这里的声音呼应。/ 广场上英雄碑正在兴建啊，/ 琢打石块，像清脆的鸟鸣。//……/ 我们惯于踏上征途，/ 就像骑兵跨上征鞍，/ 青年团员走在长征的路上，/ 几千里路程算得什么遥远。// 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，/ 我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，/ 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想起你，/ 更要把艰巨的任务担在双肩。// 记住，我们要坚守誓言：/ 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！/ 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，/ 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！

《到远方去》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首发后，很快就传播开来。邵燕祥的夫人谢文秀曾在《碎片——一个右派妻子的回忆》中提及，1953年谢文秀由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，欢送会上，比她低一个年级的孙惠群同学朗诵的正是邵燕祥的这首诗。《到远方去》的诞生，标志着诗人在由战争转入建设的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的兴奋点，属于自己的题材和主题，从此他更加热切地关注投入祖国建设的同辈人，为他们写下了感同身受的青春颂歌。此后他又到东北老工业基地采访，写出了《我们架起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》、《在大伙房水库工地上》、《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》等。首发《我们架起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》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以文艺组的名义给作者写了一封信，说这首诗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，并指出：“当国家正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，全国人民正积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时候，报纸刊用诗、特写等短小文艺形式，反映祖国的崭新的面貌，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，是非常必要的，因此我们希望你继续选择生动的题材，为人民日报写这一类的政治抒情诗，使读者从中能更清楚地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，看到祖国是如何飞跃地在向前迈进，从而加强人民保卫祖国、建设祖国的勇气和信心。”^①这封信的作用不止于约稿，而是对诗人创作思想的指导。如果说，邵燕祥在写《我们架起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》时，还不是很自觉的，那么编辑部的来信则使他进一步明确了“政治抒情诗”的概念，此后

^① 邵燕祥：《政治抒情诗》，《晨昏随笔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，第140页。

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《十二个姑娘》、《我们爱我们的土地》等作品，便更是力求从政治的高度来处理这类题材了。

对邵燕祥创作思想的影响，除去像来自《人民日报》这样明确的指导外，更多的是通过那个时代“无形的手”。邵燕祥说过：“大家提到我50年代诗中的豪情，往往举《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》为例，诗的最后说‘我们满怀着豪情’云云。其实，我的原稿是‘我们满怀着柔情’地说，是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者给改为‘豪情’了，大约认为只有豪情才符合‘时代精神’吧，我当时是希望既有豪情又有柔情的，在《到远方去》中我就说，我爱你的雄心，也爱你的童心。我明白，那时的编辑不是随便删改的。因为文艺属于宣传，有一个宣传口径式的不成文法规范着我们的写作，编辑的任务是‘把关’。写作，除了自己动手，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那里支配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能指望有真正杰出的诗作出现，也就可以理解了——这不是我的自我辩护。”^①

1955年，在苏联解冻文学以及反对“无冲突论”的影响下，“干预生活”的口号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1956年，党中央提出了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正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气象的鼓舞下，邵燕祥怀着一颗赤诚的心，怀着善良的愿望，写下了一系列讽刺诗，批评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，诸如《磨道驴》、《给一位工程公司的经理》、《橡皮之歌》、《磨光的五戈比》、《拍马须知》、《关于一个同志的入党问题》等，把炽热的情感融入冷峻的思考之中，以尖锐辛辣的语言讽刺生活中的丑恶现象，表现出诗人的责任感、批判意识与胸中的正气。在此期间，佳木斯园艺示范农场青年女工贾桂香，受不住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围剿而自杀。《黑龙江日报》刊发了记者王戈所写的调查记。邵燕祥看后激起满腔义愤，写出了长诗《贾桂香》，诗中悲愤地呼唤道：“我不忍落下这最后一笔，/中国不该有这样的夭亡，”“告诉我，回答我：/是怎样的手，扼杀了贾桂香？！”

不过，在那种高度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、高度强调舆论一律的时代，当邵燕祥完成了由热情的歌颂者到冷静的思考者的超越的时候，也就埋下了罹难的祸

^① 邵燕祥：《说几句心里话——在“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”闭幕式上的发言》，《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、廊坊师范学院、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，2007年4月，第144页。

因。当反右的风暴降临的时候，邵燕祥被扣上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帽子，说他“在讽刺诗的幌子下，打着‘干预生活’的招牌，射出了他的暗箭”。^①至于为邵燕祥所偏爱，称之为“从我的血管流出的血，真诚的血”的《贾桂香》，更是为批判者所不容，硬说作者“捏造”了贾桂香的故事，“《贾桂香》一诗里，作者射出更为恶毒的子弹了，他打着攻击官僚主义的幌子，实际上把我们党团的基层组织描写成漆黑一团，对社会主义制度倾泄了深刻的仇恨”。^②就今天的眼光而言，也许只有把邵燕祥的原诗和大批判文章编在一起，才可能更完整地呈现那段残酷而荒诞的历史，才能真实记录下邵燕祥这代热血青年的心灵历程，既包括他们风华正茂时的乐观与豪迈，也包括他们在苦难面前的失望与悲凉。

1958年2月，邵燕祥戴上了“右派”帽子，一个极有才气的年轻诗人的创作生命被扼杀了。诗人背上了“右派”的罪名，被迫下放、劳改，无尽无休地检查、认罪。在邵燕祥的《人生败笔—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》，以及《找灵魂——邵燕祥私人卷宗：1945—1976》中，收录了邵燕祥被打成右派后直到“文革”期间被迫所写的交待、检查，也包括这阶段所写而不可能发表的诗作。这是一份极为真实、极为难得的人生档案，是对灵魂的拷问，是对自我的解剖。对某些阴谋家与打手，这是一面照妖镜；对年轻一代的人，则是燃烧着的丹柯的心。如邵燕祥所言：“我从1949年起……只记住了为政治服务，当作教条来服膺；而对中国的国情党情，中国的现实政治，其实又蒙昧无知，可谓一窍不通：这样，在反右派运动中碰壁，遭到政治打击，却未能就此走出误区，反而以为是为政治服务得不好或不够之故，因此要‘更好地’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、独立判断的情势下，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、政治意图的复述、图解、传声筒。反右派运动后近二十年里，我的写作一直摇摆 in ‘紧跟’和‘跟不上’之间，我的为人则一直徘徊在‘求用’和‘不为所用’之间。尤以‘文化大革命’十年为最。这时的我，已经从飞扬的‘浪漫主义’下降到匍匐的‘现实主义’，从‘不识人间有折腰’堕落到发誓遵命听话，以冀做一

① 洪永固：《邵燕祥创作的歧途》，《诗刊》1958年第3期。

② 洪永固：《邵燕祥创作的歧途》，《诗刊》1958年第3期。

个驯服的宣传工具而不可得。”^①这样深刻的反思与自我剖析，不只对于我们了解邵燕祥的写作，而且对于回顾这一段文学史和思想史，都是极有价值的。

寻找良知，重铸诗魂

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“文革”的浩劫终于过去了，邵燕祥和全国人民一道，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历史的新时期。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，邵燕祥冲破了思想的牢笼，他的诗也从狭隘的意识形态写作中解放出来，他唱着《假如生活重新开头》回到了诗坛：

假如生活重新开头
我的旅伴，我的朋友——
还是迎着朝阳出发，
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。
愉快地回头一挥手！

这表明，尽管诗人曾长期蒙受不白之冤，但在错案得以改正之后，他没有戚戚于个人的伤痛，而是以宽阔的胸襟，挥别那段阴霾的历史。当然，更重要的还是诗中这样几句：

假如生活重新开头，
我的旅伴，我的朋友——
还要唱那永远唱不完的歌，
在喉管没有被割断的时候，
该欢呼的欢呼，该诅咒的诅咒！

这是邵燕祥1979年在诗坛复出时对世界的庄严宣告，他要以一位诗人的良

^① 邵燕祥：《找灵魂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7页。

心，用他的笔讴歌进步与良善，鞭挞丑恶与腐朽。现在重新读这些诗句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不正是这样做的吗？言必行，信必果，知行统一，这就是邵燕祥。

进入新时期，邵燕祥的诗歌依然以热烈的抒情为主调，但是大大强化了“思”的成分。他的诗，特别是长诗，都有开阔的视野、深沉的思辨。50年代前期，邵燕祥曾写过一首《我们爱我们的土地》，此时他胸膛里燃烧着对祖国的一片痴情，纯真地相信：“中国的土壤是温暖的土壤，有什么美好的种子不能萌芽？”不幸的是，此后诗人和我们的民族一起经受了一起又一起巨大的苦难。今天浩劫过去了，痛定思痛，诗人发现留在我们眼前的，已不是50年代的“晨光如海的共和国”，而是劫余的“一片废墟”。这给诗人的刺激太深了，他在长诗《不要废墟》中沉痛地唱道：“啊/废墟/这还是我的共和国吗？/这难道是——我在太长太长的寒夜里/梦想着回到辉煌的阳光/用力睁大眼睛/就能望见我熟悉的一切的/亲爱的共和国吗？/这难道是——我和同伴们/踏在40年代的废墟上/高高扬起双臂迎来的/晨光如海的共和国吗？”这废墟既包括物质的，更包括精神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物质的废墟容易清理，而精神的废墟则不那么容易改变。诗人认为，一个人要有灵魂，没有灵魂就如同行尸走肉；一个民族也要有灵魂，没有灵魂就是一群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。诗人痛感到，要清理精神的废墟，要振兴中华，首先要振起民族的自信心，要召唤民族之魂！于是诗人在长诗《长城》中，让沉睡了两千余年的长城变成了一匹飞驰的神奇的神马：

我跟太阳跃起在太平洋
水淋淋地登上
北京湾，迤迤而西
曝干了鬃上的水滴
沉淀出历史之盐

在诗人的笔下，长城不只是横亘两千年、绵延数千里的古代防卫建筑，更是一种象征——中华民族的象征。长城的古老象征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，长城的壮丽象征中华民族创造的伟绩丰功，长城的呜咽则象征中华民族的耻辱和血泪。诗人笔下的长城是人化的长城，是走入我们生活中来的长城，诗人不仅赋予

长城壮阔雄浑的气势、矫若游龙的身姿，还通过长城之口，向中华民族的子孙发出了热切的呼唤：

我愿意你们惊叹于我的
古老和气势磅礴
我更愿意在你们的脚下
称你们为当之无愧的巨人
我渴望着——展开在我眼前
有一个同我的存在相称的
崇高
庄严
雄奇瑰丽的事业

这振聋发聩的警钟般的声音，在嘱咐着我们古老民族的子孙，要居安思危，随时准备着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”。在这急切而焦灼的呼唤中，人们感觉到了诗人那颗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心在剧烈地跳动。

面对灾难造成的一片“废墟”，诗人强调不忘历史的教训，这是他的《记忆》：

记忆说：/我是盐。/别怨我/撒在你的伤口上，/让你痛苦。//把我和痛苦一起咽下去——/我要化入你的血，/我要化入你的汗，/我要让你/比一切痛苦更有力。

正是出于这一思考，他写出了《历史的耻辱柱》、《童年——记十年大动乱中事》、《续〈泥鳅调〉》等诗，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，作者把燃烧的激情埋在心底，透过冷静而客观的叙事，闪耀出批判的、思辨的光芒。

这种批判的、思辨的光芒，也同样来自邵燕祥受现实触发而写出的诗上。2005年，诗人看到了方唐先生为《我是什么》一画的题词：“人是宇宙爆炸后最具灵性的产物，每个人都是宇宙奇迹中的奇迹。”这真是石破天惊！人既是宇宙奇迹中的奇迹，那就该理所当然地受到尊崇。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，诗人想到的是多少年来的人吃人、人整人、不把人当成人。面对层出不穷的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摧残，他禁不住发出了把人当成人的呼唤：

从前人们告诉我 / 我是一只蚂蚁 / 可以随时 / 让脚踩死 让手指头捻死 / 我是一根草 / 可以让风刮 让雨淋 让火烧 / 让锹挖 甚至让膝盖蹂躏 / 我是一颗螺丝钉 / 可以拧在这儿 可以拧在那儿 / 也可以扔在阴沟里生锈 / 我是一块砖 / 可以让小偷拿来垫脚 / 可以让流氓拿来砍人 / 最后粉身碎骨

现在我认定 / 不是蚂蚁 不是草 / 不是螺丝钉 不是砖 / 我是一个人 /……我只要做一个人 / 我把别人当人看 / 也让别人这样看我 / 我要甩掉蚁民和草民的代号 / 做一个人

(《方唐先生一句话》)

2006年，一位16岁的少年诗人子尤因病去世，子尤是自由的谐音，这也是他出生时母亲为他取名的含义。在《痛悼子尤》中，作者深情地、不停地呼唤子尤，而对子尤的呼唤其实就是对自由的呼唤——

子尤啊子尤，你的名字是自由。当你的灵魂飘上青天，你感到自由了吗？

曾几何时，你有过快乐的飞翔，但你那么快地堕入一只无形的黑手，你被绑架，被施刑，成了随时会窒息的牢囚，子尤。

我抛掉无神论的桂冠，为了你的生存，我祈祷上帝，而上帝欺骗了我，子尤。……

你爱我们，我们爱你，你所向往就是我们的向往啊，子尤。

你与音乐同在，你与诗同在，你与书籍同在，你与活跃的思想同在：子尤。……

我听到你母亲的招魂：自由子尤！子尤自由！

我也要呼唤，归来与我们同在吧，永远的子尤啊，永远的自由！

对邵燕祥来说，自由是他起自少年时代的向往。40年代，他唱着“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”，50年代他也在《我们爱我们的土地》中呼吁“为了能够活得像个人”，然而在漫长的政治运动中，他的自由的理想破灭了，如他所说：“那个曾经顾盼自豪的抒情诗人，从什么时候消失了？从一个朴素的人生出发，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，双手把自由交给了毛泽东。他成为庞大的革命机器上的一颗